

《汉书》思想类说

杨萍 李德刚 马良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杨萍 李德刚 马良玉 著

《汉书》

思想类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思想类说/杨萍,李德刚,马良玉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207 - 08350 - 0

I. ①汉… II. ①杨… ②李… ③马… III. ①中国—
古代史—西汉时代—纪传体 ②汉书—研究
IV. ①K234. 1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1371 号

责任编辑: 孙国志
装帧设计: 朱墨艺昂

《汉书》思想类说

Hanshu Sixiang Leishuo

杨 萍 李德刚 马良玉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 net
印 刷 哈尔滨金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2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350 - 0/D · 1083
定 价 20. 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 言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同处于二十四史的前列，历来都以“《史》《汉》”并称，它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史学巨著，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治国安邦的智慧，至今仍值得现代人研习和借鉴。在本书之前有必要对《汉书》作如下总说。

（一）班固及其家学

众所周知，《汉书》的主要作者是班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他出身于“家有赐书，内足于财”的世代显贵家庭。其父班彪极有学问，生平好著述，专心于史籍，是当时有名的学者。据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记载，班彪以前的刘向、冯商、刘歆、卫衡、扬雄等曾先后编写过《史记》的续篇，“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这些续作，班彪一方面感到“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同时又认为刘歆、扬雄“褒美伪新，误后感众，不当垂之后代”。所以，他“乐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为班固后来编写《汉书》奠定了基础。

班固十分聪颖，加之受父亲熏陶，九岁便能作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读书。建武三十年（54年），其父班彪卒，返乡奔丧，并着手整理他父亲的《后传》，觉得“所续前史未详”，于是于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在《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完成父亲未竟之史业。五年之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他私改国史，被捕下



狱,书稿都被抄走送到京师。他的弟弟班超赶到京城洛阳,替他申辩,“具言固所著述意”。明帝审阅了书稿,颇赏识班固的才华卓识,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掌管皇家收藏图书,担任校书工作。他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写成《世祖本纪》,第二年又升为郎,他自己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命他把未完的汉书稿继续编写下去,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成书,前后共用了二十五年时间。

章帝时,班固多次被召入宫侍读,并随驾出巡。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建初四年(79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名儒讨论五经异同,并亲自裁决。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初,窦宪出兵与匈奴作战,以班固为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参预谋议。后来窦宪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受到牵连,被捕入狱。永元四年,死于洛阳狱中,时年六十一岁。后人辑有《班兰台集》。

班固死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他的妹妹班昭参考东观藏书替他补作,叫同郡人马续协助班昭写《天文志》。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博学多才。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才华的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东汉很多学者都拜她为师,因其夫为曹世叙,人们尊称她为“曹大家(音“姑”)”。她对于《汉书》的功劳也是不可泯灭的。

所以说传于今世的史学名著《汉书》是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花了三、四十年的功夫才最后完成的。《汉书》凝结着两代史学家们无尽的心力和智慧,对后世的史书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汉书》体例与内容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大体上承袭《史记》的体例,全书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本一百篇,为一百卷。后来因为有的篇目分量过大,或分成上、

下两卷,或分成上、中、下三卷,终成一百二十卷。《汉书》开创了断代成书的修史之法,从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到刘玄更始二年(公元24年),记载整个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旧事。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依据《史记》的材料。

《汉书》的前半多取《史记》,后半部多本《后传》。《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又稍作变化,《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把《史记》中归于世家一类的人物都纳入列传中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十二纪”按每个人纪传的体裁,编年纪其大事。《汉书》于《武帝纪》之前增加了《惠帝纪》,其他多用《史记》旧文;于《武帝纪》后,续写了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六篇帝纪。

“八表”中,前六表分别谱列王侯世系,是根据《史记》有关各表作成的。《汉书》新增设《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把历史人物分成九等,好多帝王都列入下等,这是对汉代以前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班固是后汉人,记述前汉史实时必定要有所顾忌。只好从太昊帝记到吴广,不及汉朝,让读者凭此表来对比古今,自己去品评衡量了。所以其表名为古今,实则只记古人不及汉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范文澜先生在《正史考略》一书中阐述道:“中国自汉以下,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体,最后著述家之心里,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八表之中最受后世推崇的应属《百官公卿表》,是用汉代档案资料写成。此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官制设置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其篇幅不长,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晰地展现出来了,为后世《百官志》、《宰辅表》开辟了道路。

《汉书》的“十志”是《汉书》的精华。“十志”取法《史记》的



“八书”，规模宏大，记事比“八书”丰富、系统。集中记载了西汉的封建典章制度，是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较为丰富的历史材料。《汉书》新创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五行志》记载的虽多是一些荒诞迷信的事，但其中包含一部分对自然现象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沿革、建制、户口、物产、风俗，还记载了少数民族地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是对后代研究地理沿革大有裨益的地理学著作。《艺文志》采取刘向、刘歆的《七略》，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古代书目和书籍分类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目录学著作，有助研究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食货志》依照《史记》的《平准书》而作，记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内容相当丰富，特别是系统地叙述了周至王莽时期的土地制度及货币制度。分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它总述一代的经济制度有哪些继承前代，有哪些改变，以及生产情况发展得怎样，是纪传体史书中被看作最具实用价值的部分。这种写法对于后世修史产生极大的影响，《二十四史》各史中大部分都有食货志，是研究古代经济制度的重要史料。

《汉书》的七十传基本上仿照《史记》，除了为封建大官僚、大军事家、大学者、大文人、大科学家设立专传、合传以外，还以类相从，将行事相似的人物汇集在一起，设立类传；此外也设立了民族传，《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也保存了一些重要史料。《汉书》传中一个值得推崇的地方就是收入了所传人物的著述。这些著述有很多是有关当时政治、经济的策论。如《贾谊传》收入了贾谊的《治安策》；《晁错传》收入了晁错的《言兵事书》、《募民徙塞下疏》；《路温舒传》收入了《尚德缓刑疏》；《韩安韩国传》记入了韩安国与王恢论伐匈奴事，这样的文章很多。此外，还收入了多篇抒情、记事、议论的文章，其中很多都是研究当时

社会情况和个人思想非常有用的史料。从以上对于《汉书》的介绍可以看出,《汉书》虽然部分地依照《史记》的体例并且利用很多《史记》的现成材料写成的,但开创断代为书的先例,增设新的篇目、扩大保存史料的范围,自有与《史记》不能一例而论的地方,这些都是予以肯定之处。

(三)《汉书》的成就及其注书概况

《汉书》开创了断代成书的先例,成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典范。作为二十四史之一,尤其是开断代先例之作,它所具有的不朽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但《汉书》更主要的成就,是在其首开先河的编纂方法上。

第一,《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新体例

班固能摆脱旧传统,开创新体裁,为后世所宗的《汉书》创立了断代史的新体。他把西汉一代的兴衰过程,进行精确考核,从前到后,融会贯通,博采群书之长,创建一部史学名著。班固为了突出汉代的地位,《汉书》改为断代史,把西汉高祖刘邦的《高祖本纪》排在首篇。因此,这种断代为史的新体例,深受统治者的赞赏。当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固私改国史时,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后,不仅没有定班固的罪,反而命他为兰台令史,接着让他修完《汉书》。此书问世后影响深远,以至此后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朝便共有了“二十四史”的形成,其中,除了《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是纪传体的断代史,均没有超出他的体例。

第二,《汉书》中“十志”的创建,别开史学之风。

《汉书》内容,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和创新,为史学树新风,又为后世史学开辟道路。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化科学知识也在不断地改观。西汉司马迁著《史记》的“八书”,取法于儒经,创立了食货书与平准书,提出社会经济问题,补充了史学的内容。《汉书》的“十志”虽本于《史记》的“八书”,但却比“八书”更为丰富完备。《汉书》较《史记》有十分突出的地方,是增立



了《史记》所没有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后世的正史多有志书，大体依据“十志”有所增减，至唐朝杜佑作《通典》，南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间马端临作《通考》，大大发展了志书体。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即志书得以保存，“十志”创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封建伦理正统观念作为政治原则而成为史学的准则。

孔子著《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显然使文学蒙受正统观念支配。但是，直到司马迁的《史记》仍然保有文学直笔写史的风格，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所以《史记》把陈涉列入世家，充分估计其作用，并不认为他是“乱臣贼子”，司马迁还给项羽作本纪，也认为历史是部阶级斗争史，不是“胜者王侯，败者为寇”。但是，班固著《汉书》时，显然已经有了封建伦理观念为准则了。《汉书》把陈涉项羽合在一起，皆作列传；王莽本来篡汉，做了十五年皇帝，而存年号，在班固笔下的《汉书》，仍不承认其政权，而把王莽并列为传记中。这就充分反映了班固的史学观，已经步入为封建正统服务的阶段。因而，其著《汉书》也开创封建正统的史学方法。

另外，《汉书》的语言严密工整，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词藻，尚典雅，但比较难读。据说与班固同时的人都不易读通，名物制度又有很多变化，所以历代下功夫注《汉书》的人很多。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作注。汉献帝曾命荀悦仿照《左传》用编年体写成一部《汉纪》，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可以和《汉书》参照阅读。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汉书》的新注，基本上解决了文字和名物制度的问题，对后人研读《汉书》有很大帮助。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研究《汉书》的人不少，但从局部进行考证的居多。如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李光廷《汉西域图考》等等。清末，王先谦集各家的解释纂成《汉书补注》，近人杨树达有《汉书管窥》及陈直的《汉书新证》都可供研究《汉书》时参考。

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标点本《汉书》，采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作为底本，为了便于阅读，只收颜注，不收补注，参校了北宋景祐本（百纳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是目前运用的读本。

（四）《汉书》之“德”目简论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西汉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也是强盛一时的时期。从成就汉初“文景之治”的文景帝到一代雄主的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西汉取代了秦朝，各项制度基本上都从秦朝继承了下来，但明智的是，汉初统治者从秦朝行暴政、酷法从而导致速亡的事实中吸取教训，继而改为“休养生息”的统治政策，为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盛极一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时期的法制也向文明化过渡，酷刑开始废除。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加强了皇权，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的方法和残暴的秦始皇不同，武帝把学习和选官结合起来使用，引导人们读儒家著作，逐步统一了思想，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政治的相对稳定使得西汉在农业生产、对外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在史学领域也居于主导地位。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教育的班固所著的《汉书》中从各方面充分体现了西汉一代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德”治国为政、省身修己的突出特征。班固所著《汉书》是专为前朝西汉作的断代史。其内容丰富全面，它包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军事及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状况，论述中带有著者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和思想倾向性。所以《汉书》这部宏伟巨作不仅在体例上具有开先河之作用，其思想内容方面仍然闪烁着古人的非凡智慧，是留给



今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借鉴历史的得失,服务现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本书就是以更广阔的视野重新研读《汉书》,从中搜寻和挖掘出《汉书》里有鉴于今世治国、治军、养才、安民、修德、立志、教育的成功的策略和经验,进行总括分析,以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达到以古鉴今的目的。

“以德治国”、实施“仁政”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治国思想。《左传》有“德,国家之基也”句,把培育高尚的美德视作“立国”的根基。孔子在《论语》里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指出:实行“德政”,就会像众星围着北斗星那样获得黎民百姓的拥戴。显然,这里的“德”指“官德”,是对包括上及皇帝下至各级文武百官提出的“为政以德”的要求,既包括“君德”又包括“臣德”。《王褒传》中王褒上书的“圣主得贤臣颂”中就指出了“君臣一心,上下交泰”的君臣同心、以德治国的国泰民安的理想治世。

“德”的范围十分广泛。对于君臣来说,为君者的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与为人臣的敢于上书、力谏君主都被视为各自的美德,历来为史家所歌颂,这也是判断是否为明君、为贤臣的重要的标准之一。武帝时期注重形成逢有重大政事让朝臣之间进行论辩的风气,通过激烈的论辩,正确的意见磨砺而出。《严朱吾丘主父徐严佟王贾传》这篇合传中前七人便为武帝时期善于议政的人物,班固特此为之立传。赵充国在平定羌族叛乱问题上极力主张“安抚为主、军事为辅”的策略,在不为人理解和赞同的情况下,他不计个人安危、不谋私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甘愿冒着斧钺之诛,三次力陈利害关系,终于得到宣帝及众大臣的赞同。赵充国这种冒死坚持真理的做法正是他内心国家利益至上的拳拳忠诚之情的真实体现。为臣者,急国家之所急的爱国献身精神也是“臣德”的重要表现。“有异才”的终军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愿受长缨,二十余岁以身报国而得“终童”美誉。身为民之父母官,第一要务应属关注民生疾苦,为此班固专设了《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及《赵尹韩张两王传》两篇合传,赞颂西汉后期一批孙宝式的敢于为

民请命的官员。班固还以富有感情的笔调,记载尹翁归任右扶风,不徇私情,严厉打击豪强、务在安民的政绩,赞誉他“抱公絮己,为近世表”。班固在《张禹传》中没有作过多的评价,仅单纯地评述事实与其言行,就已淋漓尽致地刻画出那虚伪狡诈、贪财图位的丑恶嘴脸,从反面揭露了那种“为政不德”之官的昏庸本质。从班固所树立的廉洁奉公、一心治国、为民请愿的一系列表率官员形象和对无官德之官的批判,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于为官之德的深刻理解以及对高风亮节的官风的提倡,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及理念是应该被当代为政者所认真研习、领会和发扬的。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官吏至关重要,有“官为民之父母”的说法,也有所谓“父母官”的美誉。《汉书》所记汉成帝向大臣们的诏谕正是他对于那种“想民之所想”的“地方父母官”的极力提倡。各级地方官员是集权中央政令的执行者和代表,只有通过他们在地方推及造福于民的各项政策法规,才能赢得民心,皇权才能得到下层民众支持拥护,国家因而才能形成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所以,治国就要治吏,吏治才能安民,民安才能国治。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里,“官德”的重要性是历来被突出强调的。孔子曾将官吏之德比作“风”,将百姓之德比作“草”,上行下效,风吹草随。官风正,民风就淳;官德好,百姓就会起而仿效,就像孔子对季康子说的那样:“子欲善,而民善矣。”反之,官吏失德,徇私图贿之风便会盛行起来;官吏腐败,国家就会走向衰败、乃至崩溃,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东方朔传》中录有东方朔“谏武帝戒奢侈事”的言论,东方朔有鉴于武帝时天下风气奢靡,弃农趋末者众多的状况,建议武帝要想移风易俗,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必须从皇帝做起,以身作则,使上行下效。此例就是对为官者示范作用的极大的肯定。

作为一个睿智的历史学家,班固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只有人才济济,智能之士充分发挥作用,帝业才能成就,国家才能富强。加上班固本人身怀高才,却长期困居郎官的低微地位,因而对人才



问题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在青年时代显示出重视智能之士的真知灼见,经过20多年对史学的探索和本人的生活阅历体验,使他形成了卓越的人才观。

班固认为,武帝时期大批人才是应时而出的。如,公孙弘、卜式、兒宽有着共同点,三者均出身贫贱,但在武帝时均身居丞相、御史大夫要职。班固为三人合传《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在此传论赞中,发出了“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的慨叹。这正是班固时势造就人才的人才观的体现。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成效显著,到武帝时代,国家已经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大有作为了。但与此同时,汉初开国功臣多已没世,武帝意识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纪》)武帝拓宽“识才”、“举才”之路,开阔视野,把选贤用能的目光投向了原有的选官圈子之外,允许吏民以对策的形式上书言事,选拔有才识的贤者为官。因此,各方面的奇才智士纷纷脱颖而出,施展才智,如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兒宽,幽默诙谐的东方朔,荐贤的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的赵禹、张汤,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司马相如,天文历算家唐都、洛下闳,音乐家李延年,理财家桑弘羊,外交家张骞、苏武,大将军卫青、霍去病,仅武帝时期的贤才,汉书就举出14个方面27个突出人物。班固在《武帝纪》赞语中,概括出举用大批人材是武帝时期出现盛世的重要原因,“遂畴咨(即“谋于众人”)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是也。这些有作为的人物应时而出,这些人才帮助武帝成就国家繁盛的治世。可见,卓越人才在历史上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作用,《汉书》中在其他篇章中也屡有论及。班固为狂狷之士立传、批评持禄保位的俗儒,包含着必须重视具有卓识、勇于任事的真才的治国养才方略。这种思想在《汉书》多篇论述中有更多的发挥。

班固能正确客观公正地评价有过失的人才,既不回护其缺点,又不掩盖其功绩。如霍光,他辅佐幼主昭帝,保证了武帝以后政治局面的稳定,为“昭室中兴”奠定了基础,因此班固以“处废置之

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赞扬了霍光公而忘私,忠心辅政的优秀品质。在表彰其功绩的同时,班固又中肯地指出霍光有严重的过失,“不学无术,闇(同“暗”)于大理。”即霍光没能防止其妻搞阴谋活动,闻知以后又由于惧怕受牵连而加以隐瞒,加之霍光本人贪取财物,任用子弟亲属把持一切大权,最终导致霍氏死后才3年,便发生霍氏合族被诛灭的惨剧。这样的写史风格既还读者一个清晰的历史事实,又给后人以警示,要从历史人物的得失中汲取教训。又如,《杨恽传》中为读者展现了一个轻财好义、廉洁无私的形象,但此人“伐(夸耀)其行事,又性刻害(刻薄不容人),好发人阴伏(阴私)。”这也是杨恽其人遭致自我毁灭的性格缺陷,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班固对人才的长处和短处有很恰当的评价,正验证了他对“人才并非全才”的认可。这就涉及到在选才用人方面的态度,西汉时期汉武帝以“不拘一格用人才”而见称,东方朔的任用是最有力的说明。《东方朔传》中的对策、史事的喜剧色彩一方面源自东方朔本人的诙谐、风趣、幽默及多智之才,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汉武帝作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具有“识才”之慧眼,“用才”之气魄,“待才”之宽容。汉武帝认识到人才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国家千秋大业在于养才用人,对人才不可求全责备,要不拘一格,方能聚各方各类贤才,为我所用。这种用人选才的理念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是一条重要原则,这是古人早已践行的真理。另外,《霍光传》还为我们提供了古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方略。霍光辅政权大势重,辅政期间结怨不少,遭至谗言。年少有为的昭帝不仅没有盲目听信谗言猜忌霍光,反而对恶意中伤的风气加以震慑,为忠臣伸张正义,堪称“既任且信”的典范。向后人昭示了一个用人之道,即,明君只有信任所用之人,才能使谋臣忠于内,将帅战于外,尽心竭力,报效朝廷。

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的。西汉一代比较强调德治的重要性,《吾丘寿王传》中载吾丘寿王与丞相



公孙弘辩论“禁民挟弓弩”一事，吾丘寿王以雄辩和睿智阐述了其“德主刑辅，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公孙弘终被折服。汉代实行德治的同时也注重法治的力量。高祖刘邦念“父老苦秦苛法久矣”（《高帝纪》），初入关就与民约法三章代替秦苛法，对法律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法律制定后要严格地履行，任何人不得逾越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西汉时已有体现。《张释之传》有“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名论，任廷尉之职的张释之没有因为一个平民惊吓到正在巡行的文帝的马而从重处治。他认为应该严格执行法律，不可因一人一时的喜怒随意治人之罪，否则，“是法不信于民也”。由此也得来司马迁的赞誉，“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执法的轻重如一由此可见。治狱公平具有惩恶和警世的双重效果。《宣帝纪》有：“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论述；《景帝纪》中，“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强调官吏执法的慎重，要轻法宽刑，公正执法。

西汉的各代统治者认真分析秦“梦传万世二世完”的亡因，就在于皇室贵族穷奢极欲，对百姓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导致政荒民怨，最后在农民的一片起义声中覆灭。西汉时期十分注重吸取前代秦亡的教训，一方面，无论是身为一国之君抑或是一朝之臣，努力完善自己的德性，以令普天下黎民百姓景仰，为万民树立良好的典范；另一方面，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首要，要以“国家之根本在民”的思想为指导，制定和实施“以民为本”的统治思想，真正把“民安”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贾谊就极力主张施行“仁政”以“安民”，民安方得维持汉王朝统治。《徐乐传》中徐乐向皇帝所上“言世务书”充分体现了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思想。谷永一再指出“百姓困、赋敛重”将引起祸乱，宣扬“以民为基”的儒家民本思想（《谷永杜鄴传》），也得到班固的赞扬。西汉统治者正是以此为长期的治国思想，于是才有

了重视农业生产,减轻税收,减免徭役,减轻刑罚的与民休息的一系列政策的施行。

治国安民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结构,农业是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因此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农耕,视农业为“本”业。《文帝纪》有:“农,天下之本也,务莫大焉。”以农业为治国之本由此可见。《景帝纪》:“雕文刻镂,伤农事也……农事伤,则饥之本。”《昭帝纪》也提出“天下以农桑为本”景帝和昭帝均把农业放在最基本的位置上加以保护。

要使农业成为国家的经济基本保障,从而实现阴阳调和的理想状态,首要的是行“与民休息”之策。对于统治者来说,只有对农民制定宽松的政策,才能提高农业产量,稳定农村社会,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国家秩序。具体的措施是减轻农民经济负担,文帝和景帝时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赋税分别降到了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况;《昭帝纪》:“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昭帝也曾减免人民的口赋税。景帝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桑,素有蓄积,以备灾害”,(《景帝纪》)减轻农民繇役负担。《元帝纪》:“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地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元帝下诏除了赦赐天下外,还极力提醒百姓要不违农时。通过各代的“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使民不役于沉重的赋税徭役之苦,而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辛勤耕耘,尽地力之产,这对于整个西汉的强盛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推崇“贵和”精神,追求天下太平之治世。古人早已认识到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有力保证,也认识到战争对于社会经济造成的强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各代不遗余力营造和平环境,促进社会发展。《主父偃传》中录有主父偃所上之《谏伐匈奴书》,阐述了好战必亡,和为最贵的治国原则。汉代,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经常侵扰边疆,



民族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汉书》关乎民族关系的篇章有《匈奴传》、《东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均体现了班固民族和好的主张。《南粤传》中载录了文帝与南粤王赵佗互致书信,借此表达历史学家主张安辑边境民族关系的深意。信中文帝不以皇帝之尊压人,而是态度诚恳、措辞谦和,语重心长地说明战争只会给汉和南粤造成祸害,“得一亡十”,所能得到的极小而危害极大,从希望国家安宁之大计出发,要求赵佗与汉通使如故。文帝以诚意最终换得赵佗的真心归向,他重新盟誓永远当西汉朝廷的藩属。光武帝、明帝也曾一再排除群臣中分歧的意见,相继派出使者与匈奴聘问通好。这些和好的民族政策是使得汉朝时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保证。

当然,和平的环境固然可贵,但是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汉武帝时期在具备了征伐匈奴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时,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做出了果断的清算。汉武帝就曾多次亲帅大军征伐匈奴,西汉历史上还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如张良、冯唐、韩信、李广、周亚夫、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冒顿等。他们在军事实践活动中分析准确,知己知彼,战术灵活,战略高远,因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其军事思想理论和指挥艺术具有重要的军事科学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借鉴。

本书还对《汉书》中有高尚之德,宏远之志者分篇论述,如朱买臣的矢志不移,努力奋斗,终于成功的精神和知恩必报的品德;杨恽轻财好义、廉洁无私的品性;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等等。以期通过正面引导弘扬,使读者能够从中有所领悟,深受启迪,在个人的修己省身方面树立可供参考的典范。

总之,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断代史巨著《汉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内容丰富,蕴含着古人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无尽的智慧。今天读来,仍极有裨益,是值得今人不断深入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典籍之一。